

第一辑 小道与大道

谣言又被称为『小道消息』，这个词大大消解了谣言的本相。殊不知，小道的背后有大道。谣言是什么？人们为什么闻谣则色变或窃喜？历史的尘垢中不难活捉几条吐着红蕊的谣言之蛇，剥开一看，原来谣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我要恭喜你，如果你的身上附着了这条谣言之蛇，那就意味着你是一个有着一定分量的角色。不要相信什么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恰恰起于智者。

中国历史上谣言大盛的几个时期

谣言的产生有着明显的规律。作为意识形态的谣言在历史上的出现往往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一般说来，战争产生谣言，暴政产生谣言。反过来亦如是，谣言引发战争，谣言引发暴政。中国历史上谣言大盛的几个时期就集中在这些方面。

诺鲍伊尔说：“谣言是一个专横的创作者兼社会诠释者，没名没姓，而且戴着面具。只有极端的怀疑态度才能抵挡它的窃窃私语。”战争一来，谣言漫天。

历次起义，都以谣言作先锋。耳熟能详者莫过于秦末那句“大楚兴，陈胜王”了。其实秦末的谣言远不止此这些。秦始皇时期是中国历史谣言大盛的较早时期。《搜神记》载长水县童谣：“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异苑》载：“秦始皇，何僵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

酒，唾吾浆。飧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两汉之交同样是这样一个谣言大盛的时期。东汉刘秀为做皇帝，也让儿童唱：“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无独有偶，唐武则天时期因“牝鸡司晨”故也造就了谣言大盛。唐代中书令裴炎要造武则天的反，让京城小儿传唱：“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元末朱元璋要做皇帝，童谣唱：“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说“谣言是骚乱的近亲”一点不为过。

正如谣言与战争是近亲一样，谣言与政治也是姐妹。谣言堪称检验社会治乱的唯一标准。因此，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都成为谣言大盛的时期。特别是1900年的谣言种类与数量之多，史有明书。那些五花八门的谣言，也反映出中国百姓的想象力之丰富，以至于世界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出现了诸如《北京的洋人尽遭屠戮》《大屠杀已得到证实》之类的消息。谣言引发骚乱与恐慌，连美英等国的最高层也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悲观”之中。这“忧虑和悲观”最后导致了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战争。

统治者也深知“谣言是国家权力的敌人，秩序的对头”。历代统治者都把谣言斥为“妖言惑众”而努力想扑灭它。扑灭的结果要么引来一场战争，要么引来一场暴力。

为了改写历史，后世便有了一种新型谣言诞生，这便是后人对几十、几百年前的历史上的人、事进行造谣和传谣。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例子便是秦始皇的出身问题。

《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说秦始皇是吕不韦所生，史公言之凿凿，而且直书嬴政为吕政，《史记》中多处明指暗指。史公何以确知？据后世学者考证，这当为汉人不满秦始皇暴政而造的谣言，旨在从根本上否定秦始皇的合法性。这等后人造前人的谣，后世并非罕见。

始皇帝创天下一统之最，灭东方六国，焚书坑儒，在他统治时期，暴政不得人心。秦法：“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如此严酷的禁谣令，却偏偏造就了谣言大盛。就连有名的“孟姜女哭长城”这样一个流传千古的民间传说，在始皇帝时未始不是一个谣言，或者说当世根本无此事，是后世造的谣。一个弱女子哭倒长城，可以有多种解释，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一个谣言。这是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经后人加工传播，成为民间故事经典，进一步发生传播的偏向的一个明证。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现经一些学者考证都可能是后世的谣言，如长平之战秦国坑赵国四十万士卒等，以致牵连到造反英雄项羽，明明阿房宫还没有建起来，谣言硬说是他火烧了阿房宫，影响几

千年，谣言真正可谓是个不死的女神。这都是秦自商君、韩非以来用政治秩序来消解文化秩序种下的果子。

自古以来，统治者深恐谣言之蛊惑人心，因此谣言都被当作一种乡野恶俗，必去之而后快。汉立以后，先是奉行黄老之学，力主清静无为，少扰民；后“独尊儒术”，继往思来，“日夜怵惕，修身正行”（《汉书·淮南厉王传》）。天子修身，吏为循吏，以教化代刑杀，故谤谣较少，相反，“三七末世，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系”（《拾遗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鸢枭哺所生”（《后汉书·循吏列传》）”这等赞谣倒不少见。然自王莽创新前后，情况就大不一样。在汉元帝时，家族势力剧增，酷吏增加，豪强兼并，外戚专横，刘氏衰弱。一方面，“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前汉纪》卷八），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大姓举兵，社会政治危机四伏。这给谣言盛行培育了土壤，随着王莽得势，各种谣传的符命大兴。平帝元始五年冬驾崩，就有白石上刻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汉书·王莽传》）符命就是一种谣言的载体，假托天意。王莽有了符命，却故意下禁符令，目的就是“为了垄断自我神话的制造，他要将天机隐匿起来，不令他人窃用。在汉兵逼近的生命最后关头，王莽尚怀抱其符命不弃”（于迎春《秦汉士史》），说穿了，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学样。地皇四年，王莽大赦天下时说：“故汉氏舂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

婚姻党与，妄流言惑众，悖畔天命。”除刘伯升外，当时起义的士族大姓达四五十家，更多的是举宗从军，遍及东南西北中各个地区。战争给谣言滋生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后汉书·刘玄传》：“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东观汉记》：“更始在长安自恣，三辅苦之，又所署官爵皆群小，里间语曰：使儿居市决，作者不能得，佣之市空返。问何故，曰：今日骑都尉往会日也……由是四方不复信向京师。”

最后，还有一个深层的文化动因，导致西汉末年至东汉初，谣言出现新的形式。这就是所谓“谶纬之学”。“谶”是预言，神降预言；“纬”与“经”相对，是解释经典的书。其源出于汉人推崇的阴阳之学，所谓“天人感应”。谶纬讲究符命兆应，故有“图”有“书”，其名目皆系时人伪造，神秘晦涩，充满术数类话语，以激发人们参解天机隐秘的好奇心。王莽为登天子宝位，大规模地命人炮制图谶和符命，利用这种新型谣言大造舆论。什么“天帝行玺金匱图”、“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在反王过程中逐渐取胜的光武帝刘秀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酷爱图谶符命，并懂得利用百姓对图谶符命的深信不疑，制造谶谣扬布天下，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以致他的部下为迎合其心理，竟敢私自增损图书：“君无口，为汉辅。”（《后汉书·儒林列传》）一时间“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以致重谶不重经，影响至于东汉。

武则天时期、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还有抗战时期（诸如国民党造共产党“共产共妻”的谣言）……几乎构成中国一部特殊的历史，展卷读来，更有趣味，限于篇幅，不得不另外行文。

谣言与一个王朝的覆灭

公元前 213 年，贵为天子的秦始皇刚刚从北边巡视回来，谣言女神便降临到他身边。有童谣唱：“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二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这个五字谣言在古代并不被视为谣言，而是当作谶语，有预卜未来吉凶之意。之所以被看作是谶语，就在于这句话后来被验证了。同时也可看出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差别：西方文化历来重视谣言的研究，有谣言女神和谣言诗学；而中国文化中没有谣言女神和谣言诗学。谣言被纳入阴阳、天命观。这一点我们还可从古代许多谣言中看出。谣言以人言为载体进行传播，但中国古代许多谣言最初是以谶语形式或刻在石头上，或藏在鱼腹中，有的还藏在天相中，尔后再传播开来的。

今天仔细分析这句五字谣言，当然不是要追究是谁造了这样的谣言。追究是谁造了谣是没有意义的。谣言是一种集体行为，“一条消息必须得能传到许多人的耳朵里才能称之为谣言”（诺伊鲍尔《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它由公众制造同时又代表公众”。我们试图通过对它的分析，建构中国古代的谣言诗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句五字谣言？谁是最先造谣者？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内容来表现这句谣言？这些似乎都是无法回答的天问。但通过历史事实仍可发现些蛛丝马迹。首先这句谣言出现的时机正是秦始皇从北部边境巡视归来之际。秦始皇巡边的目的—来是展现自己一统天下的伟大功绩，向黔首们昭示自己的威德；二来安抚边境。但谣言偏偏出现了“胡”字。“胡”是秦王朝对北部边境少数民族的通称。早先周王室灭商借力于胡，周的灭亡也是胡（犬戎）所为。胡对秦朝也构成一定威胁。

也正因为如此，当秦始皇一听此谣言，首先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发兵北境击胡，继而进一步的举措便是修筑长城。在此过程中，秦始皇为自己选择了掘墓人，陈胜吴广便是被征发前往修筑长城的士卒。然而，有意思的是，谣言中的“胡”最终指向的并不是对秦构成威胁的“胡”，而是萧墙之内，自家的儿子胡亥。秦始皇为何没有想到此“胡”呢？从当时秦朝的政治来分析，秦始皇自不必想到此“胡”会是断送自己江山的罪人。秦始皇历来重视法家学说，在他的封建制下，自己的儿子是和普通平民一样的，没有特殊的权力。况且，在秦始皇的众多儿子中，胡亥只是其中的第十八个儿子。但历史偏偏给秦始皇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政权偏偏落到了此“胡”手上。此“胡”之所以成为秦二世也仅仅是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原因只是一个叫赵高的宦官害怕秦始皇的法定继承人长子扶苏而制造出来的一个阴谋。“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句五字谣言实则道出了秦王朝的全部政治和短短的历史。

这句谣言生动地证明了“它（谣言）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及时。另外还要以谣言的形式亮相。它原本是通过‘听传’来传播的，这也是它最初的传播媒介。‘听说’、‘有人说’、‘有传言说’，这些字眼正是谣言女神由耳及心的钥匙”。

时隔不久，又有新的谣言相继出现了。同样出自《史记》：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

又：

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瀛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一篇《秦始皇本纪》就详细记录了三则谣言，秦始皇与谣言女神的关系可谓深矣。与其说秦朝是亡于农民起义，倒不如说是亡于这些谣言。

谣言制造历史，也改变历史。

谣言与反间计

谣言和战争是一体的。以中国古代兵法“三十六计”中第三十三计“反间计”为例，它将谣言的“妙用”发挥到极端。

“反间计”的原文是：“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大意是在疑阵中再布疑阵，使敌内部自生矛盾，确保我方万无一失。自古至今，为做到知己知彼，在战争中，双方使用间谍是十分常见的。《孙子兵法》就特别强调间谍的作用，认为将帅打仗必须事先了解敌方的情况，“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里的“人”，就是间谍。《孙子兵法》专门有一篇《用间篇》，指出有五种间谍：利用敌方乡里的普通人做间谍，叫因间；收买敌方官吏做间谍，叫内间；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叫反间；故意制造和泄露假情况给敌方间谍，叫

死间；派人去敌方侦察，再回来报告情况，叫生间。唐代杜牧解释反间计时如此说：“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不管是哪一种间谍，他们的作用都是用来收集对方的情报。间谍作用非常大，一个成功的间谍胜过十万大军。正因为如此，敌对双方都有一套“反间”的手段。比如收买对方的间谍以探知对方的情报或者向对方传递错误的情报就是常用手法，但是这种手法不一定保险，于是有一种散布谣言、挑动对方内部自生矛盾达到削弱对方力量的做法即挑拨离间法史不绝书。这种有意散布谣言、制造假象、混淆视听、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难度大，但一旦成功成效非同小可，因而也是最高明的手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懂得利用谣言来达到反间的目的。燕昭王薨，惠王自为太子时，不快于乐毅。田单乃纵反间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惠王闻之，即使骑劫代将，毅遂奔赵。齐人大喜，田单以火牛阵大破燕军。这是典型的散布谣言达到离间敌方的做法。

同样，陈平纵反间于项羽，一方面花钱贿赂，一方面配合以谣言，致使项羽疑范增而逼走了这位军师智囊。最有名的莫过于《三国演义》里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

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说是蒋干中计，其实是曹操中计。疑心重重的曹操碰上自以为是的蒋干，演技高超的周瑜配上设计诡秘的谣言，一出好戏配合得天衣无缝。尤其是这样一节：

那蒋干因心中有事，难以入睡，三更即起，见帐内残灯尚明，桌上堆着文书，便下床偷看，他见有蔡瑁、张允写给周瑜的一封投降书信，不禁大惊，忙将其藏到了身上。这时，周瑜在床上翻了个身，说起了梦话，道是数日之内要让蒋干看那曹操的脑袋。蒋干连忙熄灯上床。将近四更时分，只听得有人进帐唤道：“都督醒了吗？”周瑜装作梦醒的样子，故意问那人说：“床上睡的是什么人？”那人答道：“都督请子翼一同睡觉，怎么忘记了？”周瑜懊悔地说：“我平日从未醉酒，昨天喝了，不知可曾说过些什么？”那人道：“江北有人过来。”周瑜小声喝道：“低声！”又叫：“子翼。”蒋干装作睡着，一声不应。周瑜同来人悄悄走出帐外，蒋干则在帐内偷听，只听来人在外面说：“蔡、张二位都督道：‘急切中无法下手。’”后面的话因声音太小，无法听清。一会儿，周瑜回到帐内，又叫：“子翼。”蒋干不应，仍然蒙头假睡。

在这里，本应大肆张扬的谣言变得诡秘起来，只有这样才骗得过蒋干，骗过了蒋干就等于骗过了曹操。尽管还辅有“铁证”——伪造的降书，但这不是关键，伪造的降书难以骗过狡猾的曹操，关键在于谣言的心理作用。只见“蒋干取出书信，并将听到的事情一一告诉了

曹操。曹操大怒道：‘这两贼人竟敢如此大胆！’遂唤蔡瑁、张允入帐，未容二人分辩，即命武士推出斩首”。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其实更多的时候，人们更容易相信听到的东西。从心理学上分析，看到的东西往往要经过一番大脑的思考再化为行动，而听到的东西在大脑中停留的时间要短得多，有时甚至来不及思索就化作了行动。

《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诸葛亮也使用了一回反间计：当孔明先生刚刚七擒孟获班师回朝，就听“细作”飞报，曹丕已死，司马懿督雍凉兵马。孔明一生最怕碰上这位司马，正想计之时，有后来被孔明挥泪所斩的那个马谡献上了反间计。“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曹睿素怀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阳、邺郡等处，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贴诸处。使曹睿心疑，必然杀此人也。”孔明从之，即遣人密行此计去了。

这一计差一点要了司马懿的老命，要不是曹真及时出面制止，司马大人恐怕司不成马了，更没有后来的东山再起。整个三国历史很有可能会重写。

因谣言而反间计成，因反间计成而损失惨重的莫过宋金对峙以及明清对决之际。在宋、金长期对峙中，金人采取“用敌制敌”策略，扶立刘豫为皇帝，来治理占领区；岳飞为了颠覆刘豫政权，巧施“反间计”，并利用金兀朮仇视刘豫的心结，废黜了刘豫，也是用敌制敌；最后，金兀朮利用宋高宗对岳飞既爱又恨的矛盾情

结，与秦桧联手，主导另一出反间计。前者计成除了一个“汉奸”，后者计成则去了一个岳飞。表面上是一报还一报，实质上南宋吃了大亏。

无独有偶，明清对决之际，真是冤家路狭，汉人又碰上老对手“后金”即“清”。著名的皇太极反间袁崇焕就在这个生死存亡关头上演了。

本来后金与袁崇焕对峙多年，后金无可奈何，努尔哈赤都在战斗中受重伤不治，皇太极也视他为眼中钉。然而，堡垒却从内部攻破了。

刚开始，崇祯帝对袁崇焕是非常器重的，没想到，打了败仗的皇太极却绕道河北直扑北京城。后金军队突然出现，引起了京师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好在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疑心极重的崇祯帝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

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的意

思，你可知道？”

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所谓的情报是彻头彻尾的谣言。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这是《三国演义》三江口事件的重演。两相比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曹操三江口中计后尚可鼎足一方，而崇祯皇帝中计后再无回天之力了。

历史就这样因为一两则谣言而改写了。回过头来我们看《水浒传》发现，梁山好汉与大宋对峙之时看不到任何谣言，而最后招安了，相关的谣言反而出现了。这个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